



扫二维码 看大学视界

我国很多行政规定都不够细化,其中有很大的操作空间,其导致的结果就是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,反而是一些很严重的问题被政策保护起来了。

兼职兼薪, 四味杂陈

■本报记者 陈彬



我们的高校来说,又会带来什么改变呢?

忧:影响教学怎么办

在上文提到的调查中,除了六成表示赞同的受调查者之外,其余的人所担心的几乎是同一个问题,那就是当高校教师将精力放在兼职上时,是否会影响到教学和科研的本职工作。事实上,这也是自《意见》颁布以来,人们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。

对此,有些人是不以为然的。程松便坦言,教学其实是一个良心活儿,同样时间内,不同态度的老师其教学效果差异非常大,而政策的变动并不会很直接地影响教学。“比如我个人的社会事务就很多,但我依然还会每天挤出时间备课,这其实是责任心和职业道德的问题。”程松说,教学是没有办法通过法律和规定来束缚的,即使没有《意见》的颁布,那些想兼职的人早就已经在做了。所以看到通知时,他“心里很平静”。

然而,更多的人并不能做到如程松这般内心平静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,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陈超的话很具代表性:“这项政策短期内将会激发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力。但从长远来看,如果教师把更多精力和时间投入科研转化和外部兼职之中,不可能不对其教学科研等本职工作造成影响。要防止‘科研第一、资本第一、产权第一、股权第一’等思想扭曲高等教育的基本理念和核心使命。”

那么,该如何规避这种风险呢?在来清华任教之前,何平曾在国外留学并在国外高校任教。据他观察,在美国高校其实也存在教师兼职现象,甚至有的教师自己创业开办公司。至于如何规避兼职对教学和科研的风

险,美国高校存在一种“软性”约束。“年轻教师在拿到长聘之前,是不可能没有时间做兼职的。”何平介绍说,在拿到长聘之后,大部分教师会继续专注于教学和科研。而对于一些兼职较多甚至创业的,大家会形成一种“不再做学术”的口碑,其学术话语权会大大削弱。

在何平看来,高校中的一部分能力强、有余力的教师的确可以去承担一些社会责任,但如果鼓励所有教师都去兼职、挣外快,导向就错了。“我们应该在教师群体中形成一定的自我约束机制。”

当然,形成这样的自我约束机制是需要时间的。在短期内,更多的人还是希望政府出台相关的监督政策。而就在《意见》颁布后不久,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也表示,目前正在考虑允许高校教师兼职兼薪具体办法。但一些具体办法中是否有相关的监督措施,目前还不得而知。

惑:谁知道还会不会变

在采访过程中,记者曾试图寻找一位有兼职经历的教师。但让人有些失望的是,几乎所有有此经历的教师都婉言谢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。至于原因,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师对记者说出了这样一番话:“政策变化的随意性太强,现在虽然允许兼职兼薪,但谁能保证不久之后,政策还会不会变?所以这时候还是少说话为好。”据他介绍,目前学校有些老师虽然知道了这一政策,但依然没有动作,其原因也在于不知道这一政策会持续多久。

在此,我们可以简单梳理一下近几年来,围绕着高校教师兼职的问题,有关部门出台的文件。

2012年,教育部出台了《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》,明确提出,高校教师兼职如果影响教学,可能会“丢饭碗”;2013年,教育部公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》,鼓励高校教师兼职但不获薪酬;2014年至2015年,陆续有包括北京、广东等地颁布政策,允许高校教师兼职;2016年9月,教育部党组又印发了《高等学校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若干规定》,明确要求高校领导干部不得随意兼职。

从中不难看出,虽然相关部门对于高校教师兼职兼薪的态度在逐渐放开,但几乎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。在这样的情况下,老师们的这份疑惑似乎也并非毫无必要。

采访中,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表示,当前国内教育领域的很多政策的确存在着“不知什么时候出台,不知什么时候又禁止”的问题。

在程方平看来,解决政策多变问题,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加强教育领域的相关立法。他表示,当前,我们有《高等教育法》,也有一些经济类的法律,对于教师兼职行为都可以进行一些相应的规范。将相关规定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确定,也能保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。“当然,一方面我们要健全法律,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严格遵守法律。”

在这方面,在记者之前的采访中,曾听到有高校工作人员感叹:“在长期的行政命令影响下,我们的高等教育领域存在着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那就是某个部委的意见大家都当成法律;反倒是真正的法律,大家选择视而不见……”

思:政策不能太“粗犷”

除了政策多变性的问题之外,对于此次颁布的《意见》的具体内容,程方平也有着自已的一些看法。

“这里有一个问题。”程方平说,之前我们限制教师兼职,其主要目的是防止高校中有一定权力的人以此进行权利交换,防止腐败。因此,之前限制兼职的具体人群主要是高校中的处级以上领导,但此次《意见》的颁布,并没有对内容做细化处理,而是一刀切。这样的做法未免太过“粗犷”了。

“应该说,我国很多行政规定都不够细化,其中有很大的操作空间,导致的结果就是该解决的问题没解决,反而是一些很严重的问题被政策保护起来了。”程方平说。

正如前文所提到的,目前科技部、教育部等单位正在针对高校教师兼职兼薪的管理细则问题,推动中国科学院、中国社科院、高校等单位制定相关细则。

对此,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高校要建立科学的职务考核、评价体系。近年来,高校都加强了对教师和科研人员的考核,但是由行政主导的考核体系并不完善。有的教师长期“吃空饷”,鼓励教师和科研人员兼职,很可能加剧这一问题。“只有在高校内建立和完善基于教育和学术本位的考核、评价体系,才能引导教师专注本职工作,提高工作质量,在此基础上进行兼职。”熊丙奇说。

(应采访对象要求,本文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)

中国大学评论

最近看到报纸上的一篇专题评论,主题是有关“象牙塔”的,大意是希望大学走出“象牙塔”,全方位地与社会对接,而且强调说,这是“高校改革必须交出的答卷”。可是问题在于,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看,中国大学从来都未建成所谓“象牙塔”,又何来“走出”一说?

熟悉中国高等教育史的人都知道,自从19世纪中期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建立以来,大学本身的体制一直在完善之中。上世纪20年代末、30年代初开始的学科化进程,很快因为“九一八”事变而中断。在民族危机的关头,学者也不可能“躲进小楼成一统”。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在致友人的信中提到自己是属于专心学问之人,他也确实公开提倡过建立“学术社会”的必要性,甚至极而言之,学者可以不受任何的外界影响,不对任何专业以外的事情负责。但抗战爆发后,他还是走出书斋,编《禹贡》杂志,成立通俗读物编辑社,以此来直接贡献于民族和社会。

所谓“象牙塔”的标志之一的学科,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才作为单一学科建设被人提及;90年代初,作为整体的大学学科才开始恢复建设;到2000年,也还有大学校长从“学科”一词的ABC讲起。为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,清华大学前校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中还特别形容“学科”是“大学的细胞”。

记得前些年,著名学者葛兆光曾在复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,呼吁复旦的学生要敢于做“学院派”。这一呼吁自然也是有针对性的。因为现今社会对大学生的诱惑实在太多,安心读书者愈来愈少,没有“为学术而学术”的执着是不可能在学习上有所建树的,这一点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学生或更为重要。

这个呼吁同时也说明,直到最近,无论是“象牙塔”,还是“象牙塔”的核心——学院派——都没有真正出现。

实际上,我们对于大学之为大学的理解,始终没有确定下来,因而对于大学的要求和期待也始终在发生变化。上世纪90年代末,各地兴建大学城时,似乎是在模仿美国大学。选址市郊小镇,旨在与都市保持距离。但现如今,所有的大学城似乎都不再满足于办大学、培养学生了。远离都市早已变成制造卫星“寂寥小镇”成了公司林立的“创业热土”。上世纪80年代,北大破墙开店,还引发了全国性争论。现在,即使大学仍旧有围墙,但校内之人与社会之间的心理围墙早已不复存在。

没有“象牙塔”却奢言“走出象牙塔”,而且类似的说法几乎不绝于耳,没有人提出异议,除了知识单一、人云亦云以外,也与所处的位置和所站的角度有关。

平心而论,校内、校外对大学及其状况的感受不同,实属正常。地方政府划地、拨款以后,是希望见到实效,以便突出政绩、增加GDP;企业更加现实,想上大学毕业生招之即来、来之能用,以减少成本、提高效益。他们抱怨大学没有体现出为社会服务的意识,没有将科研成果快速转化成生产力,学生“不上不下”,难以适应社会和企业的要求,或也情有可原,但这中间大学作为教育机构,其自身的追求和话语权也不能被忽视。

大学是分层的,管理也需要分层。如果真有“象牙塔”这个高等教育的选项,我们不妨就建它几座,看看究竟有没有价值。如果真的没有价值,再解构、转型或者“走出”也不迟。

即便是走斯坦福大学式的社会“服务器”的路子,这个“服务器”的内存软件也还有直接有用与间接有用之分。拿应用的标准来衡量各大学、各学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,显然是不解大学风情的。因为与应用性科研相比,基础性的科研成果也不能在短期内转化成实际的效益。而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,也未必非要科研人员亲自走进市场,锤炼吆喝才能实现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清华大学副校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所说的“不应该鼓励科学家创业”,确实是逆耳忠言。

我们说,教育要百年树人,但实际上做的时候却往往会以短期成效代替从长计议。其实,跟风赶场不应该成为大学与有理性的学者的追求,更何况没有学问的支撑,不仅“伪学术”会打扮成真学术而畅行无阻,就是贡献智慧、出谋划策,也未必能提供最真实的意见和最合理的选择。



本版图片来源:百度图片

未见『象牙塔』,何以谈『走出』

尤小立

浙江农林大学:多措并举促学风建设

■本报见习记者 王之康 通讯员 崔婷婷 陈胜伟

前段时间,走进浙江农林大学的很多教室,都会在门前或前排桌子上发现一个“新设施”——手机收纳袋。与当下“机不离手”的普遍现象不同,在他们的课堂上,学生全神贯注地在座位上听课,手机则静静地躺在收纳袋里。

这是浙江农林大学推出的“无手机课堂”活动中的一幕。

从本学期开始,浙江农林大学着力在学风建设上下功夫,在原有的规章制度之外,陆续推出了“无手机课堂”“阳光晨读”“阳光晨跑”“早餐不打包”等新举措,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风。

“无手机课堂”让“抬头率”提高了

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,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在上课时间使用手机上网,这不仅影响了个人听课质量,也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课堂秩序。“基于此,我们学校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,在大一学生中全面推行具有半强制性的‘无手机课堂’活动。”浙江农林大学团委书记董杜斌说。

手机收纳袋上标着阿拉伯数字1至54,分别对应每个学生的学号。根据规定,上课前,学生要将手机关机并“对号入座”,放进收纳袋中的“专属机位”,下课后方可取回。

对于习惯了互联网生活的人来说,手机依赖早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。工程学院大一学生施佳成就有着深刻的感触:“以前上课时把手机放在桌子上,总是不控制不住自己打开手机玩游戏,玩着玩着就放下了,现在有时也会下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或桌子找手机。”

不过,推行两个月来,学生们越来越支持这一举措:“以前上课时错过了很多重要的知识,现在推出了‘无手机课堂’活动,能够帮助我们上课集中注意力,专心听老师讲课,课堂氛围也变得活跃了。”施佳成说。

不仅如此,据董杜斌介绍,在以呼吁、号召为主,并不作硬性要求的大二、大三、大四学生中,也有不少人自觉地参与到“无手机课堂”活动中,上课前主动关闭手机,或者干脆不带手机去教室了。

小小的手机收纳袋在提升课堂效果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,法学院教师马永双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:“同学们上课‘抬头率’明显提高了,课堂气氛也变得融洽了。以前会有个别学生玩手机发出声音影响上课,现在不再有了。这个手机收纳袋还可以帮助同学们在提升自制力,充分利用课堂时间学习,提高上课效率。”

“阳光晨读”“早餐不打包”让学生赖床少了

古语有言:“朝起早,夜眠迟;老易至,惜此时。”如今,很多学生对“夜眠迟”这一点保持得很好,却总是将“朝起早”抛之脑后。基于此,“阳光晨读”“早餐不打包”举措便应运而生。

“所谓‘阳光晨读’,就是鼓励学生早起,有效地利用清晨时光读书的活动。”学生会学风部部长孙陈存说。

其实浙江农林大学不少学生有晨读的习惯,而且地点也相对固定,大多集中在图书馆周边和学生活动中心附近。为了引导更多学生早起,学校推出“阳光晨读”活动后,在上述区

域分别设置了五六块标识牌,上面写有“‘阳光晨读’区”,用来提示不晨读的学生不要在此处嬉笑玩闹。

文化学院大三学生王莉目前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的晨读,她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起床,约三五好友同行,前往图书馆后面的东湖边。“那里风景好,空气也好,非常适合晨读。”王莉说,“我平时读英语比较多,练习口语、背诵四六级单词等。晨读让我更有计划性,效率也会更高。比如现在两天记忆300个单词,以前可能需要好几天,而且还容易忘记。”

“早餐不打包”活动也旨在鼓励学生早起,但不同的是,该活动有学工部、研工部、团委等部门和学生会等组织的广泛参与。

据了解,从早晨七点半左右开始,老师、学生会干部就会在餐厅门口、教学区等地方监督,告诫学生不要带早餐进教室,呼吁大家在食堂用餐。作为学校后勤管理单位,学校几个食堂也在源头上加以控制,尽量不给学生打包早餐。

活动刚推行时,工程学院大二学生吴丰杰带着打包好的早餐刚走出食堂,迎面就碰到了几位志愿者,告诉他早餐不能带进教室。于是,他利用到教室前的三秒钟时间,狼吞虎咽地吃完了打包的早餐。对此,他很不习惯,也颇为不满。但事后转念一想,他觉得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身上:“因为我平时起床有些晚,本来来不及在食堂吃早餐,所以只能打包带到教室,一边听课一边吃。有时候吃一些具有刺激性气味的食物,现在想想也觉得挺不好的。”从那以后,吴丰杰每天早晨早起20分钟,预留出了在食堂吃早餐的时间。